

说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于历史学学术体系构建的一点思考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的关键步骤之一。这一方法论的本质要求, 是激活史学遗产中那些优秀部分, 使其融入当今史学之中, 获得新的生命力, 为丰富和推动史学发展而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当今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为了探索这一关键性步骤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 本文以“重民”思想和读史“明道”为例, 分别从历史理论层面和史学理论层面, 作一点粗浅的说明, 借以和史学界同行共同讨论, 推进这一重要学术步骤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重民思想 读史明道

一 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8VXK006)的阶段性成果。

展的总目标要体现三个特点：一是继承性、民族性，二是原创性、时代性，三是系统性、专业性。^① 这表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首先必须在继承性、民族性方面有所作为，因为这是“中国特色”的基本要求和主要标志。

对于历史学来说，这是面临着在新时代如何把史学遗产纳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但是，自觉地把“遗产”纳入当今的学科体系的构建中来思考、研究，确是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习近平主席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②

这段论述表明：从重要性来看，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从研究工作来看，要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从方法论来看，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本着这样的认识，史学工作者必将自觉地把研究史学遗产同当今学科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一般说来，这种结合至少要经历三个实际步骤：第一，有系统地梳理史学遗产的存在状况；第二，从梳理过程中发现那些与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有密切关系的概念与观念及相关成果；第三，尝试着对这些概念与观念及相关成果作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融入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中来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推动当今史学的发展。

上述三个步骤中的前两个步骤，史学界同行做了不少工作，笔者在有关论述中也讲到过一些。而关于第三个步骤，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①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二 关于历史理论方面的思考

对史学遗产中的优秀成果作创造性转化，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一是要讲清楚某一观念或某一成果所产生的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二是要指出这一观念或成果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融入当今历史学学科建设。

这里，先从历史理论方面作一点说明。《古文尚书》的《五子之歌》篇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①的说法，大意是把本（即民）稳固了，邦（指国家）才可能安宁，而人君则是这里的主体。这里，就《五子之歌》所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来看，是关于君、民、邦三者之间的关系：君是统治者，为了“邦”的安宁，首先要“民”稳定好。其意托名“太康失邦”，“述大禹之戒以作歌”^②等说法，后人多有异议，但其关于君、民、邦三者关系的观念，尤其是“民”的重要性，多为后人所关注。在这个观念中，“民”不是主体，君为维护“邦”的安宁而必须使“民”得以稳固而不乱。尽管如此，“民”的重要性还是凸显出来了。

在先秦思想家的论著中，这种“重民”的思想也很突出，《孟子·尽心下》这样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这里也是讲到君、社稷（国家）、民三者的关系，但“民”排在首位，“君”放在最后。显然，在孟子看来，三者之中，“民”是最重要的。这种“重民”思想，在司马迁《史记》及其以后的历史著作中，也多有反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写道《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④。这一撰述主旨，是司马光的撰述思想的集中表述。在这里，接受《资治通鉴》的宋神宗及其统治集团为主体，而“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是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继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发展之后继续发展时期，其达到的成就多为近人所称许。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司马光从纷繁复杂的史事中，极其鲜明地突出“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两个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反映了这位史学家的深邃的历史眼光。

① 《尚书·五子之歌》，《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第156页。

② 《尚书·五子之歌》，《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第156页。

③ 杨伯峻编著本《孟子·尽心下》，中华书局，1958，第328页。

④ 司马光《进书表》，见《资治通鉴》附录，中华书局，1956，第9607页。

类似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还可以举出一些。这表明，在中国历史上，“重民”思想是有久远的传统的。尽管它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但“重民”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以往的历史上，不论是把“民”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还是把“民”视为“国本”，以及把“民”之休戚看作与“国家盛衰”同等重要之事，其中有一个政治前提也是始终存在的，即“民”是人君、君主、皇帝维护其政治统治的施政方针之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民”思想本身必然带有避免不了的历史局限性。

对“重民”思想这一历史理论方面的珍贵遗产实行创造性转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历史、研究历史并联系现实的历史运动，进而对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提出本质上的认识。1944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文章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观、历史观。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①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这一论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本质概括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1945年5月，毛泽东进而指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他进而强调说“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③毛泽东在一个月中间两次论述人民的作用和地位，并说这种观念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而划清了与历史上“重民”思想的界限，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视人民为历史的主人，这既是传统的“重民”思想转化的条件，也是其转化的归宿。可以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武器，驱除笼罩在传统“重民”思想四周的“人

① 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04页。

②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31页。

③ 毛泽东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73~374页。

君”“君主”“皇帝”的神圣光环，使其获得新生，从而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历史内涵。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推动着理论的发展。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步伐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历史迈入新时代，“人民”这个伟大的名称在中国这块辽阔的、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再一次升华，获得更深刻、更庄严的含义。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①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最新表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新发展。

当我们把问题提到当代认识的新高度时，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和践行对史学遗产作“创新性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创造性发展”，首先是明确发展的方向。所谓“方向”，一是正确性，二是时代性，把握住这两条，可以说是明确了发展方向。第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对史学遗产中的某个命题、某种观念或某一论著作新的解说，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发展思想进行阐述，使其内涵更加丰富。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表明，人民是历史进程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从国家层面来说人民乃是国家之本，等等。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历史学学术体系构建中的继承性与民族性特点。

三 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思考

上文是从历史理论方面举例说明，这里再从史学理论方面举例说明。历史理论是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与此不同的是，史学理论是人们关于史学这门知识或这门学科的认识，二者研究对象不同但又存在密切的联系。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中国史学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史学理论遗产。二十多年前，我们承担了《中华大典》的《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工作。在“史学理论总部”中，我们划分了史学功用部、史家修养部、史学方法部和史学批评部，而于各部中又各划分若干子目。应当说，这种划分是带有探索性的，比如，“史学功用部”分为史学与蓄德、史学与彰往察来、史学与惩劝、史学与资治、史学与经世、史学与明道、史学与历史等七目。其实，其中蓄德与惩劝相近，彰往察来与明道相近，资治与经世相近，这种细分只是为了便于编次罢了。

以史学理论遗产为例，我们怎么认识和践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就以“史学功用”来说，它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历史上这方面的名言、佳句所反映出来的观念亦时有所见。如唐太宗明确表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①，“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②；刘知幾指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③；杜佑更是明确宣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④；顾炎武引用唐人殷侗建议科举考试增设“三史”科及“三传”科之事，认为明朝“若能以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⑤。王夫之进而把问题说得更为具体、明白“盖尝论之，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只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⑥这一段话，对史学功用做了极好的概括。

显然，对于上述这些思想遗产，确有必要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新的生命力，在当今史学发展中发挥作用。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方面谈史学遗产，一方面谈历史教育，而他的历史教育思想蕴含着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意识，他的许多论述，实质上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着转化与发展工作。^⑦今天，我们更应该高度自觉地把转

①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中华书局，1960，第6657页。

② 唐太宗《修晋书诏》，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81，中华书局，2008，第467页。

③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281页。

④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书首自序第1页。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16“史学”条，黄汝成集释本，岳麓书社，1994，第597~598页。

⑥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三》，中华书局，1975，第1110页。

⑦ 参见瞿林东《史学工作者的光荣职责——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的使命感意识》，《光明日报》2020年3月25日。

化和发展的工作做好。

这里，我们举史学功用部的一个方面即史学与明道的关系，略作分析。历代史家与学人，多有论述史学对于人们明“道”的作用和意义，重在强调史学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主张的影响。“道”是中国思想史上含义最复杂的概念之一。《老子》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①这是把“道”视为万物之本原。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②显然，这里说的“道”是政治主张的意思。孟子则这样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③孟子是在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时说这番话的，有学者把这里的“道”解释为孟子主张的“仁政”，意谓好的治国主张。孟子还说过“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④这同上文讲“人和”是有联系的。介于《老子》和孔孟之间的一种观点，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⑤这表明，“道”是万事万物生成变化的法则，是无数事物生成变化的依据。关于道，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上述三种观点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后两种观点在史学上比较常见，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不止一次地讲到“道”。他在回答上大夫壶遂的问题时，说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他在提到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各有著作以及“《诗》三百篇”时，认为这是“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⑥。这里说的“三王之道”，是“三王”治理社会的主张；而“不得通其道”的“道”，当是指人的社会思想或学术见解，二者有一定的相近之处。

宋代思想家、史学批评家叶适认为“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古今。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古今并策，道可复兴，圣人之志也。卓然谓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晓然见后世可为

① 《老子·二十五章》，《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第14页。

② 《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1958，第177页。

③ 《孟子·公孙丑下》，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1960，第87页。

④ 《孟子·尽心下》，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1960，第329页。

⑤ 韩非《韩非子·解老》，《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第107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第3297、3300页。

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难，不可不审也。”^① 在笔者看来，叶适讲的前一个“道”贯通古今，指的是法则；后一个“道”指的是“圣人之志”，指的是治理社会的主张及其践行。清代思想家、史评家龚自珍极看重史学，多有这方面的评论，他在史评文章《尊史》中指出，史者之尊在于深于史而明察社会、国家，最后写道“尊之之所归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此非我所闻，乃刘向、班固之所闻。向、固有征乎？我征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聃，卒为道家大宗。我无征也欤哉？”^② 龚自珍提到刘向、班固，其实他比刘向、班固所论要深刻得多。他又归结到老聃，但他并非在讨论万物之本原，也不是在讨论韩非所说的“万物之所然也”。从《尊史》全文来看，龚自珍正是说的史学及其与社会之所然也的问题，即其中的法则、规律，人们为了认识这一法则、规律，首先必须研究和认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尊史》这篇短文，是一篇阐述历史哲学的大文章。

自司马迁以后尤其是两宋以后，许多史家和学人都谈到史学与明道的关系，反映了这方面的思想遗产是很丰富的。因此，我们在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它们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本来意义的基础上，对它们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有了更多的条件和更大的空间。在现代汉语中，“道”可以作为方向、方法、道理来理解，这同孔子、司马迁说的“道”比较相近，就是同孟子说的“道”有“仁政”或“仁”的含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相去不远。毛泽东曾在1970年发表了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20声明”），其中就引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名言^③，给我们作“转化”“创新”工作以深刻的启示。

如前所述，古代史家与学人所言之“道”，往往带有后人所言法则、规律的含义，毛泽东在讲到认识规律的方法论时，同样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他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④ 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认识历史发展过程

①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19《史记一》，中华书局，1977，第269~270页。

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81页。

③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586页。

④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06页。

对于认识规律的关键作用。显然，运用这一方法论来看待史学上的“史学与明道”的种种说法，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并对其作“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一步丰富当代史学理论的内涵。举例来说，龚自珍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名言，由此而被激活获得新的生命力。

* * *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需要史学界同仁共同致力于此，才能有所建树。这一学术工程首先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这是由工程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继承性、民族性的关键所在，在于对学术遗产中的优秀部分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做到并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了解学术遗产的面貌，二是要对当前学术发展态势有较全面的认识，三是要对学术前景有所判断。这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需要集体的努力和团队精神。这篇短文只是把问题提出来，用举例的方法作粗浅的说明，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完成这一重要的学术工程。